

脱下长衫赴国难
拼出电台通延安

于伯贤用短暂而辉煌的一生，为胶东装上了『耳朵』和『嘴巴』

□紫苏



于伯贤用过的水杯和怀表。



抗战时期所用大刀。

于伯贤(原名于希增,化名李达)是招远市金岭镇中村的一名普通的农家子弟,胶东红色电波的奠基人。从三尺讲台到抗日战场、从教书先生到电台台长,他用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书写了一段“投笔从戎赴国难,电波万里连延安”的英雄史诗。

—— 投笔从戎 ——

1905年12月,于伯贤出生于招远金岭一个殷实的农民家庭,8岁入私塾,后考入天津北洋大学机械工程系。1930年,他返乡后在招远一中教学,1934年应同窗好友马耀南之邀到长山县中学任教。

1937年深秋,日军飞机刚刚轰炸过附近的城镇,远处的天空还飘着硝烟。长山中学校园里风声鹤唳,教室里早已没了学生的踪影,于伯贤站在窗前,看着这一切,一言不发。

他本想安安穩穩教一辈子书,用知识为这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培育一点希望。可如今,连这点希望也要被炮火碾碎了。“偌大的华北,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他喃喃自语,眉头紧锁。

几个月前,他送走了妻儿。他对妻子说,你们先回招远,我随后就来。可他知道,他不会“随后就来”了。他舍不得这所学校,舍不得那些学生,更舍不得在这个国家最需要人的时候转身离开。可他不会打仗、不会带兵,甚至连枪都没摸过。

“国难当头,岂能心灰意冷?”马耀南推门进来,“热血男儿,应当脱去长衫赴国难,投身到抗日洪流中。”于伯贤转过身,他看着这位老同学,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走到衣架前,把身上的长衫脱下来,叠好,放在椅背上。“你说得对,”他说,“这身长衫,是该脱了。”

那年冬天,长山县保安大队成立,于伯贤第一批加入。12月27日,黑铁山上举起抗日义旗,他随部队起义,成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的一员。从那一刻起,招远人于伯贤,不再是教书先生了,他已是胶东大地上勇敢投笔从戎的班超了。

—— 创建电台 ——

1938年4月,于伯贤随部队东进了胶东。他被分配到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政治部下属的联合出版社工作,负责油印小报、宣传抗日。因为工作认真、成绩突出,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13日,胶东区党委机关报《大众报》创刊。凭着北洋大学机械工程的底子,加上在南京无线电训练班学过的技术,于伯贤被任命为电台首任台长。

这个台长,当得属实不易。那时候,电台什么都没有。连一台像样的收音机都找不着,更别说收发报机了。敌人封锁得紧,外面的东西运不进来,一切都得自己想办法。没有电表,于伯贤就用小灯泡代替;没有绝缘子,用破罐子顶上;没有胶木板,就用木板拼接;没有刻度盘,用纸和木板自己刻;没有电键,找块竹板削一削凑合着用。能做的他都做了,关键零件还没凑够。

他决定取之于民。他跑遍了周边的村庄,从老乡家里搜罗旧电器,拆下还能用的零件。有些老乡听说他是八路军修电台,翻箱倒柜地把家里积攒多年的旧收音机、旧电话机都翻了出来。于伯贤如获至宝,一一拆解,把能用的零件小心翼翼地分类收好,等着派上用之地。

可还是不够。有些零件,民间根本找不到。他决定冒险。他化装成老百姓,偷偷潜入敌占区,几经周折,总算买回一些杂牌的无线电零部件。一路上,他把零件藏在棉袄的夹层里,混过一道道关卡,回到驻地时,后背已经被冷汗湿透。

随后的几天几夜,他把自己关在一间小草屋里,对着那些零件拆了装、装了拆。油灯燃尽了一盏又一盏,他的眼睛熬得通红,高度近视的镜片后面,是一双专注到近乎偏执的眼睛。

终于,一部只有三只真空管的收报机,在他手里响了起来。那是1939年9月的一天,他和电台的工作人员,日夜守候在收报机旁,在漫天杂乱的信号中仔细搜寻。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有人开始焦躁,有人怀疑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于伯贤不说话,只是戴着耳机,一动不动地坐着。突然,一个清晰而坚定的讯号出现了。那是新华社的声音!

“收到了!收到了!”有人激动地喊起来。于伯贤摘下眼镜,擦了擦镜片上的雾气,又戴上,仔细听了又听。确认无误后,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脸上的表情,像是在笑,又像是在哭。胶东抗日根据地,终于有了自己的耳朵!

—— 生死守护 ——

有了耳朵,还得有嘴巴。于伯贤心里一直装着这件事。他带着电台的工作人员,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艰难转移,一边坚持工作,一边琢磨着怎么把发报机也造出来。

他们长期在敌人的包围中周旋,离敌人据点最近的时候,只有十几华里。于伯贤反复叮嘱大家:“我们虽是电台人员,但要有军事化作风。不论白天黑夜,要做到说走就走,坚决不拖报社后腿。”

1939年冬,他带领电台的工作人员,随胶东区党委从蓬、黄、掖平原向山区转移。大家昼伏夜行,跨越千余里,背着重重的收报机和手摇发电机,在敌人的鼻子底下穿行。白天,他们隐蔽在山沟里休息;夜里摸黑赶路,不敢生火,不敢大声说话,连咳嗽都要捂着嘴。饿了啃几口干粮,渴了喝几口山沟里的凉水。

1940年2月,发生了一件至今想起来都让人后怕的事。那天,于伯贤正在组织抄收新华社播发的重要文章——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文稿很长,抄收下来需要四五个小时。抄到一半,情报传来:敌人出动了,正朝这边扑来。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有人建议马上撤离,中断抄收。于伯贤站在那儿,沉默了几秒钟。

“不能撤!”他说,“这篇文章很重要,明天的报纸要登。一旦中断,前功尽弃。”他迅速作出决定:继续接收电讯稿,一刻不能停;非电台人员立即转移;立刻请求部队派人阻击敌人,能拖多久拖多久。

敌人越来越近的消息不停地传来。于伯贤站在收报机旁,一言不发,死死盯着那根颤抖的指针。周围的人在收拾东西,在低声催促,他仿佛什么都听不见,只听见耳机里传来的滴滴答答的电报声。

最后一个电码抄收完毕。“撤!”他一声令下,大家抬起设备,迅速撤离。当他们爬上驻地北面的小山时,身后响起了敌人的机枪声。第二天,《大众报》全文刊发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这篇著作能够及时传递到胶东抗日根据地军民手中,靠的是于伯贤和战友们冒着生命危险换来的那几十分钟。

1940年7月,电台转移到招远坡石山。大雨突至,山路泥泞。于伯贤高度近视,镜片被雨水糊住,一脚踩空,抱着收报机翻入深沟。战友们赶去拉他,只见他满头是血,双手却死死抱着那台收报机,一刻没有松开。他爬起来,抹掉脸上的血水,继续赶路。收报机完好无损。

—— 首次发报成功 ——

1941年8月,《大众报》创刊三周年前夕,于伯贤终于把发报机造出来了。那天晚上,他和副台长葛次元守在机器前反复调试。窗外漆黑一片,屋里只有几盏豆大的油灯。他们用自制的天线,把信号一点一点发出去。当最后一串电码发出时,葛次元激动地说:“成功了!”

一

1938年9月的一天,刘延凤出生在一个贫苦的渔民家中。从此,海浪的涛声、海鸥的鸣叫,成了刘延凤童年最熟悉的摇篮曲。

4岁那年,为了躲避战乱,衣衫不整的她,怯怯地拽着母亲的衣角,挤上了一艘摇摇欲坠的小轮船,漂洋过海,踏上了艰难的“闯关东”之路。彼时,她母亲还抱着吃奶的弟弟。在冰天雪地的东北,娘仁举目无亲,靠要饭为生,顽强地活了下来。逃荒期间,他们住过废旧的桥洞,啃过

前些日子整理旧书柜时,一本泛黄的黑色软皮笔记本让我眼前一亮。它完整地保存着我33年前参加济南军区一次重要座谈会时遇到的英模人物的鲜活形象。尤其是我市神枪姑娘刘延凤同志,她曾是一名渔家女,后来却成了一名百发百中的神枪手,多次代表山东女民兵进京。

一

分几个学习小组,组与组之间展开竞赛,不懂就问教员,不会就练。渐渐地,大家都入了门。

白天,刘延凤和姐妹们搞生产养殖海带,忙活完就抓起枪往海边跑。在美丽的沙滩上,她们把贝壳当成靶子,一练就是个把小时;在渔船上,她们将海带架子当作瞄准点,在海浪颠簸中练就了保持身体相对稳定的本领。有一次,为了练习海上夜间射击科目,刘延凤竟然在一块礁石上趴了整整一夜。露水打湿了她的单薄的花棉袄,她浑然不觉;手脚冻得失去了知觉,她也不在意。她心中只有一个信念:练好武艺守卫海岛。当黎明的第一缕阳光照耀在靶心上时,刘延凤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那是她发自内心的微笑。

二

1960年,刘延凤作为全国民兵代表,走进了北京人民大会堂。罗瑞卿大将亲手将一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交到了她手里。面对这至高无上的荣誉,一行热泪瞬间涌出了她的眼窝。这是激动的泪,更是幸福的泪。

这把枪见证了刘延凤一生中的荣耀时刻,是她生命中最亲密的伙伴。从北京回到家里,她睡觉都要把枪放在枕头上。为了方叙事,军事要冲,宏大庄严,登州港、刀鱼寨、备倭城,层层叠叠,蔚为厚重;“村”乃民间视角,渔猎生计,烟火日常,是东营西营的嬗变,是晒网的婆娑、嬉闹的孩童、小学校里的朗朗书声。

将这两者叠合为一,非是粗疏,而是坦诚——它不故作姿态,存留着城的威严,也不勉强自己作为村的素朴,正如蓬莱人说话,爽直而不绕弯;城是咱的城,村是咱的村,叫一声“水城村”,何妨?既有戚继光的海防壮怀,也有老辈人的盐盐岁月;既有画河改道的匠心智巧,也有密神山下的根脉绵延。名字里那点“拧巴”,怕什么?日子过得踏实,比什么都强。

如今再访水城村(今水城社区),老一辈人还会指着掖扬门说:“那门楼子是城的,门洞里乘凉的是村儿的。”一句话,将千年的历史折叠,说得云淡风轻。

城会老去,村会长生,而名字里的这道褶皱,恰是蓬莱最堪品味的纹路。它既非“城中村”那般倚傍的过渡,亦非景区里一代传一代的古董;

向外冲,一边跑一边护着身边的设备。山路上到处是碎石和荆棘,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跑着,眼镜被汗水雾气糊住,他也顾不上擦。一颗子弹击中了他。他倒下了,年仅38岁。战友们后来回忆,于伯贤倒下时,怀里还抱着那台收报机。他一句话都没留下。

一个读书人,国难当头,脱下长衫,用破罐子和竹板拼出收报机,让延安的声音第一次传进胶东群山。他没有等到胜利,但他架起的那条电波之路,一直通到了胜利那天,甚至更远的明天……

1963年初秋时节,济南军区军事比武在青岛拉开了帷幕。那一天,英姿飒爽的刘延凤站在靶场上,面对50米外的胸环靶,深吸一口气稳住心气神。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她迅速占领射击位置,卧倒,出枪,压子弹上膛,整个动作一气呵成。“喀喀喀……”枪声连成一片,50发子弹像长了眼睛一样,全部命中靶心。当报靶员举起“50环”的牌子时,全场沸腾了。从此,“神枪姑娘”的名号名扬齐鲁。

1964年6月,刘延凤作为山东女民兵的杰出代表来到北京西山靶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那天的阳光格外刺眼,气氛异常闷热,刘延凤站在射击位上,手心微微出汗,心脏突突地跳得厉害。

突然间,她听到主席台上有人说起她的名字:“那个姑娘就是刘延凤吧?”她抬头望去,只见开国领袖像一位慈父,正微笑着朝她点头呢。那一刻,她胸中的所有紧张和压力,瞬间烟消云散了。她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打出最好的成绩,报答中央首长的厚爱。

激烈的两分钟速射开始了。刘延凤的眼睛紧紧盯着靶标,手指在扳机上跳动着。右肩被后坐力弹得生疼。1分23秒,50发子弹全部打完,报靶员的声音传来:“一号靶,47环!”刘延凤的心猛地一沉,跑了三发子弹,这可是她从未有过的失误。可是,当靶标被送到主席台前时,大家才惊讶地发现,47个弹孔的弹着点几乎都集中在同一个点上,连靶标的木制靶杆都被打断了。这时,开国领袖微笑着带头鼓掌:“打得好!弹孔都凑在一起,比我当年打靶多多了!”

接下来的表演项目是精度射击,目标是150米外的汽水瓶。她深知,真正考验自己的时刻到了。刘延凤深吸一口气,卧倒、瞄准、击发,动作一气呵成,像一个武艺高强、指挥若定的将军。“砰!”第一个瓶子应声而碎。“砰!砰!砰!”紧接着,第二个、第三个……当第五个瓶子破碎时,她身旁的战友还有两个没击中。刘延凤毫不犹豫地调转枪口,“砰,砰”两枪,麻利地将战友剩下的两只瓶子全部击碎了。这时,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开国领袖站起身来大声称赞:“真不愧是神枪姑娘!”

“神枪姑娘”的美称,出自共和国开国领袖的赞誉,也自此传遍了神州大地。

三

这次进京比武回来之后,刘延凤的人生轨迹悄然发生了改变。她从乡镇海带养殖厂的一名副厂长,一步步成长为长岛县的第一位女副县长。刘延凤回忆说,到县政府上任那天,她背着国家赠予她的那支半自动步枪。一位同事见状,半开玩笑

海风中的神枪姑娘

□康勤修

地说:“您现在是副县长了,不用扛枪了。”刘延凤却摇摇头:“枪不能丢,民兵的本色不能丢。”

在长岛县副县长任上,她抓生产不忘国防,抓稳定不忘武装,一面把工作重心聚焦和瞄准群众生产生活,一面结合长岛实际,倡导开展“以劳养武,富岛强兵”活动,确保劳武结合,两不误两促进。

1978年,刘延凤同志调任烟台市妇联主席一职。上任伊始,她就跑到附近一所幼儿园进行调查研。她发现孩子们在破旧的教室里上课,心里很不是滋味。她四处奔走,筹集资金,在全市建起了第一所功能齐备的现代化幼儿园。上世纪80年代初期,改革春潮席卷港城,她倡议发起“巾帼建功”活动,组织全市妇女学习缝纫、养殖技术,帮助上千名妇女走上致富路。

四

1998年,刘延凤把她获得的军功章和那支伴随她走过39年革命生涯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忍痛割爱捐给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工作人员接过这杆枪时,发现枪托上的“保卫祖国”四个大字锃光瓦亮,当即立即正敬礼向她表达敬意。临别时,刘延凤抚摸着这杆步枪的枪身,眼里满含不舍,她动情地说:“老伙计,你要在这里好好站岗,让人后知道,我们这代人是怎么保卫祖国的。”

2007年,神枪姑娘刘延凤同志退休了,可她偏偏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每天清晨,她都会去海边对着海浪练习瞄准和射击要领。她深入机关、部队、学校和厂矿企业,向人们讲传统、话国防,发挥余热。

现如今,尽管神枪姑娘刘延凤已经到了鲐背之年,尽管她的背有些微驼、头发有些稀疏,可她的眼神依然那么明亮,精神依然矍铄,话语依然铿锵有力。在渤海湾恒久不变的涛声中,刘延凤的故事像一座永恒的丰碑,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后人。她用一生诠释了什么是民兵本色,什么是家国情怀。刘延凤常常对人说:“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就是当过民兵,最幸福的事是受到过开国领袖的接见。”在刘延凤的心目中,那支步枪、那片海、那个微笑,是她一生中最为珍贵的财富。

它是由刀鱼寨的浪、备倭城的石、军户的姓氏、渔民的网具等一层层夯筑而成——城为骨,村为肉。

水城村,是蓬莱为自己留存的一口活着的歷史气息,是潮声与烟火交织成的、不曾断绝的呼吸。

蓬莱水城村的名字玄机

□蔡玉臻

数百年间,就在这城墙之内、小海之滨,渐渐有了民居烟火。天南海北的军户、渔民、商贩,其中尤以山东金乡移民为多,数十上百个姓氏聚族而居,在城隙隙地、码头侧畔、营房周边搭屋安家,娶妻生子,繁衍生息。明代,这里分为东营、西营,本属军事编制,日久却演化村落格局的骨架。

城,是国家的城;村,是百姓的村。城垛口抵御的是倭寇的惊涛,村巷里飘散的是熬鱼的鲜香。这方水土,从来便是“城”与“村”叠印交融之地。

“城中村”还是“村中城”

新中国成立后,此地正式定名为“水城村”。三字落定,两头占尽——

谓之“城中村”,并不委屈。它位于蓬莱老城西北侧,在府城脚下、市廛之间,被登州府城与现代城区层层环抱。后归蓬莱阁街道管辖,2002年“村改居”为水城社区,年轻人或出海务工,虽外观上与城市并无二致,但骨子里仍留存着村落的血缘脉络与社火记忆。

城为骨,村为肉

中国地名素重“名实相符”,然“水城村”三

蓬莱水城全景图。吕漪澜/摄